


[\[科研成果首页\]](#) - [\[所有科研成果\]](#)

[项目类型] 专职人员科研成果

[成果题目] 19世纪八九十年代俄国地主经济的基本特征

[作者姓名] 张广翔

[成果类型] 论文

[出版单位] 东北亚论坛 2001年04期

[出版时间] 2001年08月

[成果摘要]

19世纪70年代以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改革虽使2000多万农奴获得人身自由，但封建剥削制度并没有被废除，截止19世纪末，地主尽量缩小自营规模，工役制不可避免地长期存在着。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役制的基础又在日渐动摇，特别是在波罗的海、白俄罗斯和巴什基里亚等地区。整个19世纪下半期，工役制和资本主义消长的过程恰恰是后者排挤前者的过程，地主经济在这一过程中由前者向后者进行着过渡。

[成果全文]

步入19世纪70年代以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呈现明显阶段性。70年代以后地主经济经历了短期发展，80年代开始受世界性农业危机影响，1881年起俄国粮食连年歉收，到90年代地主经济不景气与世界粮食危机交织在一起，导致地主经济改造速度放慢。这一时期地主将全部困难转嫁到农民身上，扩大奴役性租金，最大限度地压缩耕地面积，到19世纪末，农民租地恰好占私有地的2/3。^①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粮价稍有回升，地主粮食生产出现一线转机，资本主义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地主用资本主义原则改造领地进入集约化新阶段，农业中资本主义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可概括这一时期地主经济发展的特点。

一、地主与农民的关系

列宁说过，地主经济内部改造，是工役制最终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基础。可见，从工役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是改革后地主经济演进的主要内容。地主土地一是自营，二是出租，或者二者兼有，出租和二者兼有就存在租赁形式，是货币租，还是实物租，二者比重如何，直接涉及地主经济经营性质评估，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易解释清楚，有必要集中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看看地主和农民的土地占有关系。根据1877—1878年人口调查，欧俄481358名私有地占有者中，贵族占23.8%，农民占56.7%，9200万亩私有地中，贵族地产占79.8%，农民拥有私有地为5.5%，平均每个贵族拥有土地638俄亩，而每个农民拥有土地18俄亩，二者相差38倍以上。^②欧俄46省(缺波罗的海)467县中，106县竟有44914户农民完全未得到土地。^③

取缔农奴制，使农民与土地分离的过程加快，地主通过割地和所谓“恩赐地”，使农民份地总数减少了72%以上。^④中部农业区居住欧俄33%的农民，而其只有25%的份地(乌克兰左岸偏差最高，相应为9%和5%)，欧俄南部农民份地贫乏，10%农户支配7%份地，西北部7%农户支配4%份地，乌克兰右岸9.1%农户只有4.8%份地。北部和东部的广袤原野，不宜农耕，多为荒凉不毛之地，份地百分比超过农户百分比，北部2%农户占有4%份地，乌拉尔附近7%农户有10%份地，东南地区8%农户占有24%份地。若真正理解农民份地的可利用性，应注意份地总面积和宜耕地比是3.7:1，而绝大多数农户份地不多于6俄亩，即所产粮食不多于20普特粮食，很难温饱。占有3俄亩份地农户达28.6%，即人们一年可得到910普特粮食，这部分农民贫困到主要靠打工糊口的程度。所以半数左右农户靠份地难以谋生，不得不额外挣钱度日。^⑤这样，迫使农民设法养活自己和妻小，租地成为其中一个主要途径。

19世纪80年代初，过去地主农民租地规模很大，非黑土带每户租地1.6俄亩，或占份地15.2%，而黑土带每户租地2.5俄亩，或占份地35.7%，初看这种判别能用黑土带农民份地保证差来解释，但事情复杂得多，对份地来说，租地最多的地区，却与农民份地保证差地区恰恰相反。例如，非黑土带租地占份地最高省份有特维尔为27.1%，普斯科夫为22.9%，莫斯科为21.8%，彼得堡为20.5%，雅罗斯拉夫为19.3%，斯摩棱斯克为19%。这些地方每户份地为9.8俄亩，租地2.2俄亩，租地占份地的22%，在剩下所有非黑土带每户份地10.6俄亩，租地1.1俄亩，即占份地的10.9%，前面6个非黑土省份地比其它非黑土省少8%，而租地高两倍多。黑土带租地占份地最高省份有顿河地区为146.3%，赫尔松省为80.6%，斯塔夫罗波尔斯基为75.1%，叶卡捷琳娜为68.4%，萨马拉为66%，塔夫里奇为61.5%，奥连布尔为47.8%，这些地方每户7.5俄亩份地，租地6.6俄亩，即占份地88%。租地占份地少的省份有，喀山省为14.9%，梁赞为17.7%，土拉为20.2%，奥勒尔为23.5%，唐波夫为24.6%，这些地区每户有7.4俄亩份地，租地1.6俄亩即占份地的22%。二者份地保证率相同，前者租地是后者的4.1倍。^⑥

可见,租地规模基本上不取决于农民份地的保证程度,当然很多农民由于极端缺乏份地,迫于生计租地,但这不决定租地规模。

租地规模只是说明地主与农民关系的外部特征,地租形式才是二者关系的内在表现。有非黑土带8省37县和黑土带9省57县地租形式的统计资料。非黑土带8省37县,主要分布在4省(莫斯科省10县、特维尔省11县、雅罗斯拉夫省4县、彼得堡省5县),30县农民租地占份地25%,37县农民租地占份地23%,30县中实物租占全部租地15%,货币租居统治地位。黑土带9省57县分布在中部黑土区的库尔斯克省10县,伏尔加河中游喀山、平扎、辛比尔斯克和萨拉托夫省18县,乌克兰左岸切尔尼戈夫和哈里科夫省19县,南方草原赫尔松、塔夫里奇和叶卡捷琳娜省10县,黑土带实物租比非黑土带普遍,乌克兰左岸百分比最高,南方草原次之。⑦参见表1。

俄国史学界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实物租是改革后俄国农业进化条件所特有的,实物租特点是保留浓厚的农奴制残余,农民受到地主压制,地主利用了农民的贫困状况。但科瓦里钦科认为这种观点失之于片面,完全忽视了农民接受实物租,远非只是出于保持其经济和勉强维持生计之需要,而且出于扩大商品生产之需要。换句话说,对农民说来,实物租虽然是严酷现实,但也包含一定的经济合理性。这样一来,农民经济处在商品生产低级阶段,对于力求扩大生产及为此需要生产工具和役畜的多数农民说来,经济不稳定是其特点,期望实物租。另外,对地主来说,实物租不仅是保护旧经营形式的手段,而且是扩大商品生产规模的途径。总之,对农民来说,实物租的奴役性质是其主要特征,同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旧形式得以补充新内容,成为一定农民阶层扩大商品生产的手段。所以实物租有双重作用:或补充旧关系残余,或促成新关系出现。只有估计到上述因素,才能理解实物租十分普遍的欧俄非黑土带和黑土带,商业性农业很发达,农民租地具有企业活动意图,实物租成为农民扩大商品生产的一种途径。

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地主仍醉心于第一种工役制,地主自营条件尚不具备是重要原因。地主拥有的生产工具和役畜情况是判断其生产能力的直接依据,尽管缺乏地主和农民拥有农具的综合资料,但比较地主和农民每一匹马需要耕地的数量是很有意义的。所有地区农民的役畜负担均比地主的役畜轻,如以波罗的海的地主每匹马耕地的数量为基准,那么非黑土带和白俄罗斯—立陶宛的地主每匹马负担重2.5倍3倍,乌克兰左岸的地主每匹马负担重6倍以上,伏尔加河中游的地主每匹马负担重11倍,地主大量出租土地确实事出有因。1881年农民每播种一俄亩份地,在各个地区应当播种私有地数量如下:波罗的海0.75俄亩,乌克兰右岸0.66俄亩,乌克兰左岸和南方草原均为0.49俄亩,白俄罗斯—立陶宛0.45俄亩,中部黑土区0.43俄亩,伏尔加河中游0.35俄亩,北部、东部和东南地区农民幸免于此。⑧地主和农民按每匹马耕地数比较,能评估出地主和农民生产能力基本情况,说明地主对农民畜力的仰赖程度。

以上情况说明,改革虽使2000多万农奴获得人身自由,但封建剥削制度并没有被废除。首先,地主不仅基本上保住了原有的土地(尽管贵族地产减少,但这是一个缓慢过程),并且以“割地”形式夺取了农民的大量份地。其次,分配份地时,地主不仅把最好的土地据为己有,把最差的地块分给农民,而且把农民份地切割得很零碎。第三,80年代世界性粮食危机,加之农业生产不景气,粮食行情不好,是地主缩减耕地面积的直接原因。透过农民份地情况,以及非黑土带、黑土带农民租地占份地比重情况,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农民以租地主的度日,这是工役制存在的客观前提。地主拥有马匹、工具的状况,又限制了生产规模,这也是客观事实,极力避免粮食市场行情不好带来损失这一心理因素也不可忽视。正因为有这样的主客观条件,在19世纪末以前,地主基本上尽量缩小自营规模,工役制长期存在就不可避免。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役制日渐动摇,下述地区资本主义发展就是明证。

二、波罗的海和白俄罗斯

西部地区贵族地产最稳定。到1905年几乎保住了从前领地的80%,而波罗的海的贵族保住了其全部土地,波罗的海每100份私有地中,贵族占94.4份,商人占2.6份,农民数字不详,但可以断定至多不超过3份。这在欧俄是决无仅有的。白俄罗斯地区贵族地产集中程度非常高,1877—1905年这里有近8000名地主,拥有870万俄亩宜耕地,人均1097俄亩。不言而喻,这两个地区贵族地产最有代表性,对研究贵族经济和政治地位变化有典型意义。

波罗的海与东普鲁士接壤的地区,封建制度瓦解最甚。早在19世纪初,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就在形式上废除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很多德国血统的贵族成为传播国外先进农具和先进耕作技术的“媒介”,改良农具和机器在这里迅速推广开来。这里靠近国外市场,销售农产品极为便利,进一步刺激地主扩大生产规模,在继续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注意兼顾乳畜业、酿酒业等,不断朝合理化经营方向迈进。在役畜、工具和劳动力方面,白俄罗斯、波罗的海贵族优越于欧俄其他地区,因而这两个地区的地主经济底气足、潜力大。加上这里贵族经营能力强,善于筹划生产,因此,这里地主经济一直处在欧俄前列。农奴制废除后,白俄罗斯地主经济中,工役制和资本主义并存。从19世纪70年代起大部分领地步入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9世纪末,商业性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和农业危机的加深,推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90年代下半年,格罗德年省的地主、富农使用雇佣劳动的占9/10,维连省为4/5,明斯克省为3/4,维捷勃和莫基列夫省为1/2,而雇农是雇佣劳动基础,1877年白俄罗斯雇农总数达14万。

19世纪八九十年代,白俄罗斯地主农具改进幅度很大,多数地主经济有风车、脱粒机、锄草机、播种机,收割机和刈草机开始广泛使用。先进领地多用铁犁、铁耙耕地。90年代中期,这里(无维连省)被调查的100个较发达地主经济,均用改良工具,5070个领地使用铁犁。伴随着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机器推广和工具完善,饲草和土豆种植扩大,古老三圃制受到先进耕作方式排挤。19世纪末,白俄罗斯地主基本采用改良的三圃制和四圃制,多区轮作良性循环耕作制度在先进地主经济中站稳了脚跟。90年代末白俄罗斯被调查的149个先进领地中,107个使用良种,24个兼有良性循环和三圃休耕,18个实行改良的三圃制。改进耕作方式,使用先进工具和农业机器效果很显著。西部5省地主和农民经济中,19世纪60年代平均每年谷物纯收获量为5700万普特,30年后,平均每年谷物纯收获量为11870万普特。同期谷物播种面积只从340万俄亩增加到415万俄亩,地主土地粮食收获量增加主要靠生产集约化。60年代西部5省平均每俄亩产量为25.7普特,而90年代为38.3普特,增长49%,地主粮食生产商品率高,大部分用于出卖。1875年西部5省外销粮食1070万普特,占私有地粮食收获量的1/3,1878年外销粮食2090万普特,占私有地粮食收获量的一半。⑨219世纪80年代起发生的世界性农业危机也波及到了俄国,中部黑土区首当其冲,紧接着危机蔓延到东南和南方草原等地,粮食生产成本超过粮食价格,这使地主大大亏本,地主欠银行债务逐年递增,仅从1887年到1895年,地主欠贵族银行债务即增加5倍。⑩

白俄罗斯地主通过发展乳畜业,改变种植结构,压缩粮食播种面积,扩大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建立酿酒等企业的办法来摆脱危机。首先,白俄罗斯地主视乳畜业为摆脱危机的最佳办法,这里的地主经济逐步向乳畜业专业化过渡,乳制品投入市场明显增加。1894—1900年,平均每年运到国内外市场170万普特乳制品,更大部分在当地脱手。19世纪末白俄罗斯地主每年将5060万普特牛奶和干酪,还有大量猪油和黄油投入市场。1900年西部5省地主饲养牛994万头,占非黑土带24省地主养牛总头数43.3%。1900年白俄罗斯运出31万普特肉。总之,地主经济中乳制品、肉制品绝大部分出卖。乳畜业收入缓解了地主粮食收入下降的

矛盾。

其次，白俄罗斯地主调整了种植结构。饲草、土豆种植面积扩大，亚麻、甜菜、向日葵和烟草等作物都占有一定席位，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比重下降。1881—1899年，私有地和份地上的土豆种植面积从21万俄亩增长到37.5万俄亩，增长75.2%，同期饲草种植面积由2.4万俄亩增长到17万俄亩，即增加了7.1倍。土豆、饲草播种面积扩大，促进了酿酒业和乳畜业发展，用粮食和土豆加工酒精。1863—1880年，西部5省地主酿酒平均每年用去320万普特粮食和470万普特土豆，每年酿40°稀释酒精180万桶，部分销往当地市场，部分运到国内其他地方和国外市场。1880年后，酿酒规模进一步扩大，1880—1894年平均每年有1000万普特土豆用来酿酒，90年代下半期每年生产40°稀释酒精800万桶。酿酒业使地主获利甚丰。19世纪末期，白俄罗斯地主经济发展很有起色，用资本主义原则改造领地有很大成效，但农奴制残余限制了这种改造进一步发展。

波罗的海地区农业发展有利条件很多：劳动力有保证，这里的劳动报酬在欧俄最高，不仅稳住了当地劳动力，而且吸引了外来劳动力；役马有保证，19世纪90年代，按地主和农民每一匹马平均耕地数来看，这里的地主和农民马匹负担最轻；生产工具和农业机器改进幅度大，如19世纪80年代里夫兰省有291台锅驼机，461台脱粒机，316台播种机，188台刈草机，304个排锯，20年后，锅驼机增长了好几倍，脱粒机增长40%。

正因为如此，波罗的海地主和农民土地利用率高，1881地主未利用的土地不足1%，而其他地区的地主未利用的土地少则4%，多则半数以上。这里的地主表现出极大的经营积极性，努力改进耕作方式，妥善安排粮食生产和其它经济作物，力求增加领地收入。

波罗的海地主不仅力图从粮食生产中得到收入，而且还积极开办各种企业。早在19世纪中叶，波罗的海几乎所有领地都设立酿酒、锯木、制砖、磨坊等企业，1860年里夫兰省4县地主有609个企业，306个农用磨坊。1878—1879年度里夫兰省地主有106个酒厂，生产纯酒精61万桶，库尔梁德省地主107个酒厂，生产纯酒精51万桶。地主企业活动不仅增加收入，而且是一年周转均衡劳力需求最佳方式，促进了农业生产高涨。

虽然没有波罗的海地主经济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完整统计数字，但通过具体解剖一个有代表性的领地，还是能说明一定问题的。库尔梁德省塔勒辛县凡德津领地，有雇佣劳动力、役马、工具、种植结构、农作物商品、收入结构较完整的资料。20世纪初，该领地共有6890俄亩地，其中耕地、牧场、草场、森林分别为705、394、1862、3244俄亩，比较该领地19世纪6090年代雇佣劳动、工具、役畜情况，表明雇佣劳动力人数一直很稳定，马匹和工具数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领地靠自筹资金向自营经济过渡和改造领地双管齐下，渐渐从工役制过渡到雇佣劳动，即使在农业危机时期雇佣劳动也未受到影响，雇佣劳动使用范围广，雇佣劳动良好作用体现在地主经济活动结果上，尽管进入80年代以后，受到粮食危机和欠收的困扰，该领地到90年代中期，播种面积一直持续稳定地增长，产量一增再增。比较一下1888—1889年度和1896—1897年度该领地的收入结构：地租收入由10.9%降至9.8%，森林和草场收入由26.6%骤降到8.9%，牛奶收入由0.6%上升到4.3%，酿酒收入从51.9%上升到57.3%，肉畜收入由4.3%上升到12.9%。收入情况是领地一切变化的综合指标，它反映出领地种植结构、田间作物和畜牧业的比例，表明该领地收入多样化，经营形式趋于合理化。

里夫兰省瓦勒克县卢加日领地占有土地12520俄亩，其中耕地、刈草场、牧场和森林分别为451、759、293和7688俄亩。1877—1881年该领地一直雇佣50名工人，其中20名用于田间作业，种植黑麦、大麦、谷子、豌豆、亚麻、土豆和三叶草，谷物种植面积和休耕地剧减，谷物作物收获量提高，领地收入增加。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通过考察凡德津领地情况，对认识整个波罗的海地主经济能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可见，采用雇佣劳动的地主经济，经营管理上积极主动，各种作物轮作更为合理，农业生产商品率高，收入来源广，这是部分地主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积极结果。

波罗的海、白俄罗斯贵族与外界交往密切，开化程度高，容易接受西欧先进生产技术，这里劳动力、役畜较有保证，改革前这里贵族具有一定生产技术基础和组织生产经验，所以，这里地主经济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历来最高。

三、巴什基里亚

巴什基里亚地处东南一隅，这里开发晚，但改革后资本主义关系有力地推进到这里，这里资本主义关系的确立与俄国资本主义向广度发展有关。

19世纪70年代巴什基里亚大部分贵族使用农业机器情况不好。1873年乌发省总督沙科夫谈道，地主得到机器多数损坏或弃之不用。1876年奥连布尔省的报纸指出：“订购的机器无一件适用”，边区缺乏善意使用机器之人也增加了最初推广机器的阻力。有些抱残守缺的贵族甚至相信，巴什基里亚的地理条件不宜使用机器。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70年代末起地主再度购置机器。1881年奥连布尔省的报纸指出，最近“大土地所有者开始添置机械犁、美国播种机、风车、收割机、刈草机和蒸汽机”。乌发省的贵族也有脱粒机和风车，但其它农业机器很少，1884年乌发省述评指出：“当地工人未学会使用复杂机器，当机器出现故障时，无处可修”。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农民分化加剧和移民大批涌向巴什基里亚，劳动力供应大大改观，这使有流动资金和工具的地主雇用年工、季节工和日工，得以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扩大经济。但边区地主经济发展并非十分乐观，贵族自营经济比重很小，很多领地撂荒，地主领地上良种马、良种牛很少，细毛羊更为鲜见。80年代下半期巴什基里亚地主经济遇到新困难，1884年起由于世界粮食危机影响，边区粮价开始下跌。歉收年景粮价提高是事实，但这不能经常补偿欠收给地主造成的损失。虽然从1892年起粮食产量稍有回升，但农业危机仍在持续，只是1897—1898年边区粮价趋于持平。经常亏损，迫使贵族在现有条件下寻找出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较有进取心的地主进一步扩大使用农业机器的规模，力求降低粮食成本，更加关注畜牧业和技术性作物，设立农产品加工企业。1885年设立贵族土地银行向地主提供优惠贷款，加上移民涌入和危机年代当地农民贫困化，以及1888—1890年兴建萨马拉—托拉斯托夫铁路，这些为地主经济度过难关提供了便利条件。但并非所有地主经济都得以顺利改造，很多由于缺乏足够资金和经营素质，便加强工役制或将土地出租，把农业危机和歉收损失转嫁给农民，更有甚者，不少贵族干脆卖地，这种现象在内地区份也很常见。在资本主义冲击和农业危机双重压力之下，不少贵族经济一蹶不振。

为在危机时期得到收入，地主必须降低粮食成本。比较务实的地主靠加强指导经营度过难关，如乌发省缅泽林县贵族别列茨基领地有地658俄亩，其中宅旁地、耕地和草场分别为9、291和106俄亩，役畜和工具自备，使用雇佣劳动，实行三圃制，1888年有马76匹，牛40头，绵羊60只，该领地经营有方。乌发县地主亚库鲍维奇有地272俄亩，其中宅旁地、耕地和草场分别为0.5、231和19.5俄亩，地主雇长工1012人，夏季雇季节工，1889年有牛105头（含乳牛45头），领地收入可观。别列别也夫县公爵沃勒康斯基领地为2865俄亩，同县贵族沙弗拉诺夫领地为830俄亩，这两个领地拥有的工具和雇佣劳动力数量差不多，但因后者更善于因地制宜，巧于筹划，使地尽其力，物尽其用，每俄亩收入高达8.2卢布，而前者每俄亩仅收入2.5卢布。

大部分领地兼有雇佣劳动和工役制，甚至某些商品化程度很高的领地也有这种现象。别列别也夫县贵族捷夫克列夫的切尔马桑领地共6439俄亩，其中宅旁地、耕地、草场和牧场分别为16、1026、2570和牧场

2218俄亩,此人十分重视乳畜业,1891年领地有226匹马,270头牛(含乳牛70头),5468只细毛羊,领地绝大部分活计雇人做,雇年工68人,夏季雇工30人,割草和割庄稼季节雇当地日工,领地部分农活实行工役制,领地有锄草机、刈草机、脱粒机和亚麻碎茎机。可见,该领地劳动力、役畜和农具保证良好,农牧业结合得较好,与市场联系渠道广,粮食销往托波尔尼诺码头,油卖往乌发,肉类运到彼得格勒,羊毛在当地脱手,经济效果显著,但领地并未放弃对分制和工役制。

在经济发展迟缓的领地,工役制占优势,别列别也夫县贵族哈里克维奇,乌发县公爵达夫列特基利杰夫,都以工役制为主,雇工为副。

90年代巴什基里亚地主播种面积呈上升势头,1897年乌发省地主播种面积103797俄亩,比1886年多1.6倍以上,1895年奥连布尔省地主播种面积37884俄亩,比1887年多2.2倍强。地主出租土地比重很大。1886—1900年乌发省有据可查的220个领地,其中81个自营,71个自营和出租并用,68个出租。奥连布尔省30个有据可查领地,其中6个自营,9个自营和出租并存,15个出租。

奥连布尔省地主经济中畜牧业几乎只使用雇佣劳动,田间作业兼有雇佣劳动和工役制。根据1897年调查,比尔县的118个大领地(250俄亩以上)共有6198俄亩耕地,其中有5096俄亩耕地使用雇佣劳动,1102俄亩采用工役制,缅泽林县116个大领地的46713俄亩耕地,其中39737俄亩实行第二种工役制,6976俄亩实行第一种工役制。间接资料证明别列别也夫县和乌发县地主经济中,雇佣劳动和工役制相互关系与上述两县接近。90年代末乌发省699个大领地共出租150788俄亩地,其中101216俄亩收货币租,29756俄亩实行工役制,22616俄亩实行对分制。

这样,贵族领地绝大多数劳动由雇佣劳动力完成,租赁多用货币租。这表明,巴什基里亚地主经济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迈出了一大步,但地主并未放弃阻碍经济发展的工役制。

顺便讲一下阿塞拜疆。根据1897年调查,该地区巴金省5825名地主使用雇佣劳动,叶利扎维特波利省4460名地主有雇佣工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阿塞拜疆地主经济中资本主义确实有所发展。

改革后地主领地上仍风行小生产,多数借助农民的简陋生产工具,地主仍沿用实物租,超经济强制没有消失,农民行政上仍隶属于地主和村社,整个农民阶级未享受到充分的公民权利,割地引起农民份地普遍不足,赎金沉重负担加剧了贫困程度,这使地主得以继续沿用落后的剥削形式,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同一种剥削形式能为不同生产关系服务,无论工役制与封建时期地主经济劳役制多么相似,但在资本主义关系确立情况下,保留旧生产关系仍是不可能的。

19世纪下半期,地主经济的演化过程表明,工役制和资本主义消长的过程恰恰是后者排挤前者的过程。列宁认为,工役制衰落原因有三:首先,商品经济发展同工役制不相容,因为工役制以自然经济、陈旧技术和地主与农民不可分割联系为条件;其次,农民分化是工役制衰落的最重要原因;第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破坏了工役制基础。到80年代末,欧俄43省地主经济中,资本主义雇佣制在19省中占优势,工役制在17省中占优势,其余7省二者兼有。

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不能一下子产生,劳役制经济不能马上消灭的情况下,“唯一可能的制度只能是一种既包括劳役制特点又包括资本主义制度特点的过渡的制度。地主经济制度正好具备了这些特点”,恰恰是这种过渡制度与19世纪俄国地主经济相始终。

(资料整理:齐山德)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版权所有 您是第1191122位访问者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林园路1788号

邮编:130012

电话:86-431-5166393

传真:86-431-5166396

E-mail: yuxiao@mail.jlu.edu.cn